

陶涵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》閱讀雜記

蔣永敬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

一

美國學者陶涵（Jay Taylor）著，林添貴譯，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》一書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2010年，以下簡稱陶書），是一本鉅著，全書連同注釋，計781頁，約60萬言。內容涵蓋蔣介石的一生，分為四大部分：（一）革命，（二）抗戰，（三）內戰，（四）島嶼（臺灣）。

陶書的中文版之前，已有英文版的發行。曾獲致一些著名學者的好評，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對陶書的評語有「陶涵成功表露蔣介石的個人特質」，以及「陶涵在蔣介石與他置身的世界之間建構了更具個人感性的連結」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的評語有「陶涵拿新史料為基礎，以全新觀點詮釋蔣介石不凡、長壽的一生，」以及「此一生動活現的論述，將會成為一本經久不衰的權威之作。」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（William C. Kirby）的評語有「本書捕捉蔣的人生及其時代，比過去任何一本英文著作都成功。」（引自陶書封面設計）

本人讀了陶書以後，完全同意以上幾位教授的評論。同時也贊同臺灣東海大學教授、現任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對陶書的評語：「總的說，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、功大於過、譽多於毀。對臺灣學界而言，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、老調重彈之感，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，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、適時『重

評蔣介石』的鉅著。」（陶書呂序）

雖然如此，但也不無瑕疵。茲就所見，列舉如下：

二

（一）陶書第 39-40 頁：「一月六日，南京臨時國會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。……後來事情有了意外的發展，在達成終身之夢、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十六天後，孫中山答應辭職讓位給袁世凱。」

按：此「一月六日」，當指 1912 年（民國元年）的 1 月 6 日。孫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是在 1911 年 12 月 29 日，是由十七省代表開選舉會投票選舉之（每省一票）。「臨時國會」通常是指「臨時參議院」，是在 1912 年 1 月 28 日在南京正式成立。陶書所謂「十六天」，如從 1 月 6 日算起，應是 1 月 22 日。這天孫致電談判代表伍廷芳及各報館，是談讓位條件，逼袁表態。2 日 13 日，孫收到清廷公布的退位詔書，始向參議院辭職。陶書所謂的「十六天」，可能根據孫之上項電報，非無故也。

（二）陶書第 58 頁：「馬林答應孫，蘇聯可以提供大量的軍事武器與補給品援助國民黨，讓一直等不到日本和西方列強這類援助的孫，聞之大喜。」

按：上項記述，是指 1922 年 8 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（Maring）在上海與孫中山晤談的內容。馬林無權答應孫「蘇聯可以……國民黨」之事，實際亦無此事。陶書所引資

料，有待商榷。

（三）陶書第 63 頁：「蔣（介石）搬出在莫斯科學到的東西，派戴季陶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，至於戴之下的副官，中共則提名……回國不久的二十七歲黨員周恩來。」

按：「副官」一詞，可能是誤譯，此種職務，在當時形同「跟班」之人，或是聽候上級使喚的「隨從」。戴之任為軍校政治部主任，是孫中山以大元帥的名義派任的，事在 1924 年 6 月 13 日，似未到任。據毛思誠《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》的記述：「共產黨幹部排戴傳賢去粵」（1924 年 6 月 28 日）。國民黨中執會於 6 月 30 日決議調戴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。周恩來是 1924 年 9 月初始從法國來到廣州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。11 月，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。（見《周恩來年譜》1924 年 9 月至 11 月的記載）

（四）陶書第 88 頁：「湖南左傾的國民黨將領唐生智，某天午夜在長沙發動對共產黨人的血腥突擊。」

按：這是指 1927 年 5 月 21 日的長沙「馬日事變」。發動此事者，是駐長沙的一位團長許克祥。此時唐在河南指揮北伐軍作戰，事後回到武漢，與汪精衛等協同處理平息此一事變。

此外，本書關於 1927 年武漢政權方面的一些論述，也有待商榷，例如「使汪駭然發覺蘇聯打算清除武漢政府的非共人士

（指羅易 M. N. Roy 5 月 30 日莫斯科的命令）。他告訴了馮玉祥，馮也緊張起來，馬上設法與蔣介石會談。」（第 89 頁）

「汪精衛也開始清共，把共產黨人趕出武漢並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。在武漢被捕的一些共產黨人遭到槍決。」（第 90 頁）

對於當時南京方面的一些記述，說蔣「下令槍斃前敵指揮官王天培」；「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衛接觸，提議和解。」以及蔣決定下臺，李宗仁「認識到蔣一旦下臺，將嚴重傷害到南京當局向上海籌款的能力，李『懇求』他再考慮。」（第 90-91 頁）

以上所記，皆有待商榷也。

（五）陶書第 132 頁：「周恩來在抵達陝北新基地之前，就在 1935 年 9 月 1 日寫了一封『正式信件』給陳果夫、陳立夫兄弟。……周的信函提到，報導指南京政府『計劃聯俄』，……」

按：周致二陳之函年代問題，多年以前，臺北方面有所爭論，認為此函是在 1936 年 9 月 1 日，而非 1935 年。今據《周恩來年譜》，1936 年 9 月 1 日是正確的。

（六）陶書第 131 頁：「1935 年 10 月，毛（澤東）率領七到九千名跟他一起竄逃的士兵抵達陝西北部的小村保安。……和以前從安徽躲到本地的一支共軍（劉志丹）結合，創造出約兩萬名士兵的軍隊。」

按：上述一段，有四個明顯的瑕疵：1、士兵人數，大約是四千名。2、保安是縣城，不是「小村」。3、劉志丹是當地的土

共，從安徽逃來的是徐海東及其部隊。4、毛率領的兵士和徐部合編為第一方面軍，共約一萬二千餘人。此在中國大陸學界，已有成熟的研究。

（七）陶書第 131 頁：「共產國際在八月一日……對中國頒布的新口號是『聯蔣抗日』。」

按：「八一宣言」是 1935 年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提出的，並無「聯蔣抗日」口號。毛抵陝北後的口號是「抗日反蔣」（1935 年 10 月到 1936 年 8 月）、「逼蔣抗日」（1936 年 9 月到 12 月西安事變）。「聯蔣抗日」是在西安事變以後。

（八）陶書第 136 頁：「春天時，張學良祕密穿過陝北共產黨地區，來到延安某個已荒廢的天主教堂和周恩來碰頭；延安此時仍由楊虎城的部隊控制。」

按：張、周延安會談的資料，大陸中共刊物《中共黨史資料》早在 1990 年公布。當時的延安，是由張的東北軍控制，張去延安無須穿過共產黨地區。會談的日期是 1936 年 4 月 9 日。10 日有周恩來給毛澤東等的電報，報告兩人會談的內容。

（九）陶書第 140 頁：「五月，周恩來在蔣擔保其人身安全無虞下，偕同共產國際（亦即史達林）的代表潘漢年在上海和陳立夫、張羣密會，……」

按：上述之事，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。潘漢年是在 1936 年 7 月與國民黨 CC 系張冲接上關係，要求去南京見陳立夫。陳要潘應先取得中共中央正式約定，始允晤談。因

此婉拒見面。11月10日，潘代表中共中央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正式會談，沒有談攏。19日，潘、陳在南京再談，仍無結果。潘當晚離南京，去上海。以上兩次，共方只有潘，沒有周恩來。國民黨方面，只有陳立夫，沒有張羣。（參見楊奎松，《西安事變新探》）至於周、潘兩人，一同和國方會談，那是1937年3月間的事了，談的對象，不是陳立夫，而是蔣介石。以上拙見，僅供參考。

（十）陶書第142頁：「孔祥熙提醒蔣西安之行太危險，但委員長反而更執意要去。……因此，他在大批高級官員、奉化護衛子弟，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，飛往西安。」

按：這是指西安事變前蔣赴西安的事。好像是從南京乘飛機赴西安似的。那時的飛機，似乎不可能容納這大批人。實際上，蔣是12月4日（1936年）從洛陽乘火車去西安的。（《困勉記》民國25年12月4日記：「以火車發洛陽」。下冊，頁528）

（十一）陶書第142-143頁：「周恩來和史達林的代表潘漢年祕密由上海到南京，繼續談判抗日統一戰線事宜。……周恩來在回去向毛報告的途中短暫逗留西安，但他顯然沒有見到張學良。」

按：上述之事，是指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以前之事。與上段（九）五月所記之事，混淆不清。事實上，周（無潘）到上海、南京，再往廬山和蔣介石談判，是在1937年5月下旬到6月15日。16日或17

日回到西安。詳細情形，《周恩來年譜》有記。這是西安事變以後半年的事了。此時張學良被軟禁在奉化溪口，怎能在西安見到他呢？

（十二）陶書第173頁：「在白崇禧的規劃下，日軍兩個師團在距徐州四十英里的鐵路支線台兒莊遭到伏擊。經過七天激戰，日軍傷亡慘重。」

按：駐在台兒莊的軍隊，是中國的孫連仲的部隊。1938年3月24日，蔣到徐州，白崇禧、林蔚到台兒莊視察，這天，日軍向中國軍隊進攻。台兒莊戰役從此開始。4月6日，日軍敗退。前後共計14天。實際上，台兒莊的外圍戰，自3月12日起已經開打。總計算起來有26天。規劃這次戰役的，是最高統帥部，白是參與者之一。（見《徐永昌日記》，徐時任軍令部長）。

三

以上所記，不敢言「評」，只是為陶書做點校對的工作，只做了全書的五分之一，就此打住，不再「吹毛求疵」。以下僅對陶書表示一點感想。

總體而言，陶書可讀性至高，是一部很有學術水準的佳作。內容新穎，見解精湛，評人論事，公正客觀。雖有瑕疵，瑕不掩瑜。